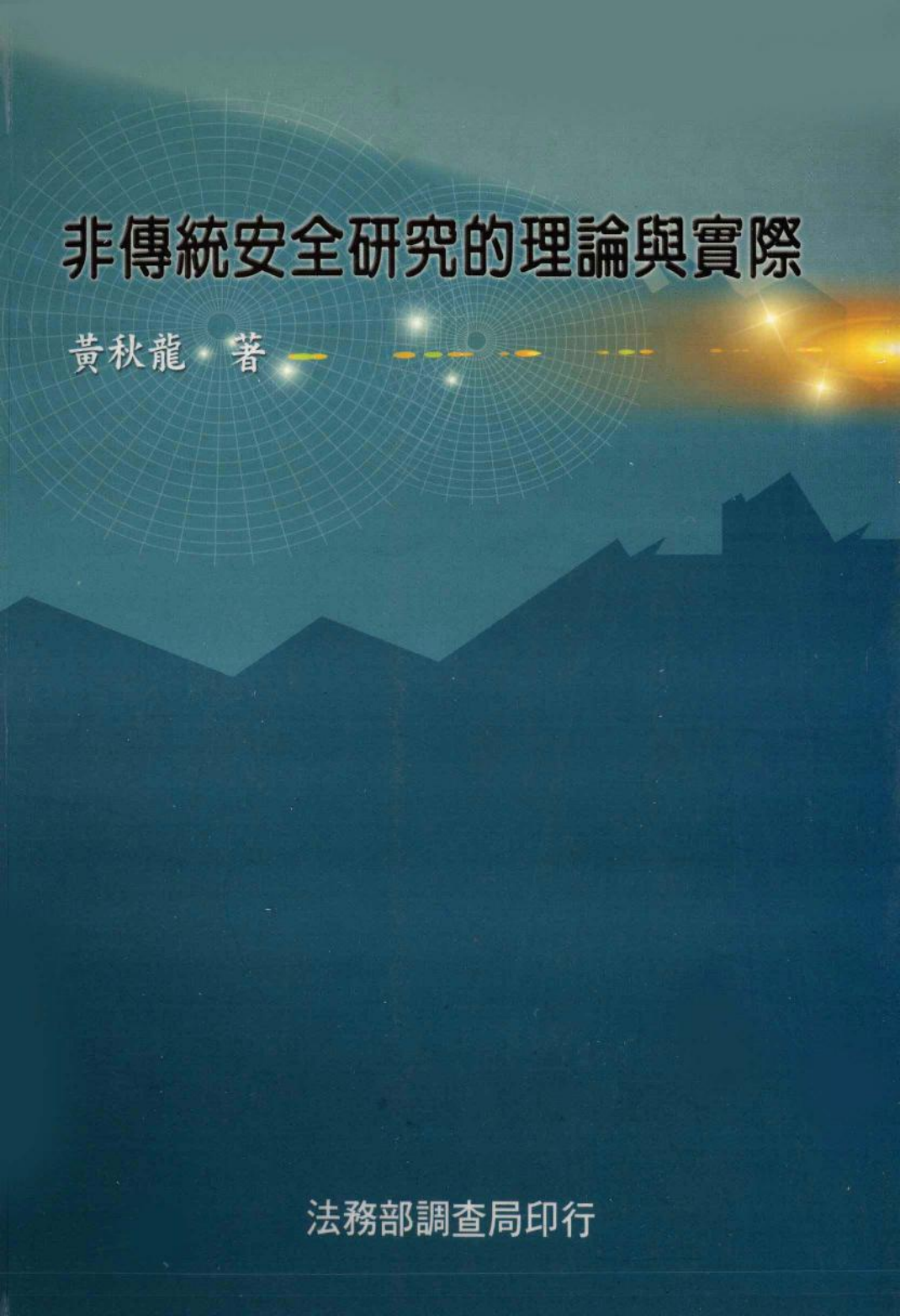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ep blue gradient. In the upper left, there are two sets of concentric circles, resembling radar or sonar waves, with a central point. A horizontal dashed line with small yellow and green segments runs across the middle.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are bright, out-of-focus light sourc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stars or distant galaxies. At the bottom, there is a dark silhouette of a mountain range.

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與實際

黃秋龍 著

法務部調查局印行

非傳統安全研究的 理論與實際

黃秋龍 著

法務部調查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與實際／黃秋龍 --

臺北縣新店市：調查局，民 93

面； 公分

ISBN 957-01-7595-8（平裝）

1. 國家安全
2. 恐怖主義
3. 兩岸關係
4. 情報(國防)

599.7

93010747

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與實際

發行人：葉盛茂

著者：黃秋龍

出版機關：法務部調查局

發行所：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縣

新店市中華路七十四號

連絡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生路四十號

電話：(02)22171100 轉 212

傳真：(02)22177755

電子信箱：E-mail：4d10@mjib.gov.tw

印刷者：科藝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大理街一五七號三樓之二

電話：(02)23020406

傳真：(02)23027230

E-mail：coeasy.art@msa.hinet.net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出版

GPN: 10093018

ISBN: 957-01-7595-8（平裝）

每本單價：73 元

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與實際

目 錄

第一章	導論-----	1
第二章	國家安全戰略與我國回應全球反恐怖主義之思辯-	27
第三章	兩岸關係中的國際反恐怖主義因素-----	51
第四章	兩岸洗錢犯罪趨勢與新興議題-----	87
第五章	大陸非法移民分布要況及其活動與影響之研析--	119
第六章	情報體制比較研究之意涵與作用-----	169
第七章	實力政治對國家安全情報機制的影響-----	203
第八章	參與式民主與綜合性安全建構的進程-----	253
第九章	結論-----	287

第一章 導 論

壹、緣 起

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y）的歷史雖然可以古老得如同國家一般長遠，尤其安全研究長期以來，始終與戰略研究相伴隨著，乃使得人們已經很習慣的學會運用戰略思想，來認知與處理實際的安全議題。由於，戰略思想主要的核心觀念，是在研究分析如何以軍事與政治、社會、經濟等的複合性手段，來在戰爭中創造出有利條件。從而，軍事安全就等同於國家安全，將國家視為唯一的安全指涉對象（referent objects）。因此，顯而易見的，就一般的慣性而言，為維護一國之安全與利益，在既有的經驗法則中，軍事與政治手段，乃是最直接而實際的。固然，這就是傳統的國家安全觀念，且是以軍事與政治手段為主，其他手段為輔的，但並未排斥社會、經濟等的非傳統安全議題。換言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實際上是相互指涉的，經常會使得安全研究的領域，擴大到相關的地區、領域、層次等等範疇。因此，安全研究與戰略研究兩者並不互相排斥，而兩者相互作用的關係，也是始終存在著。假設果真要對所謂的新的戰略或安全威脅做出形式上界定，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就是，這些威脅早已存在多時甚至令人感到習以為常。

而今之所以讓人感到有必要重新加以認知或以更實際的處理安全議題，即因為在公共安全事物領域中，出現了更多參與者，而且影響安全之途徑也隨著增加，甚至於人們對威脅敵意之強弱與交往善意

之模式會有不同卻又相互聯繫的解讀；再者，更可能是因為國家為遂行政治實踐的需要，而經常運用非傳統安全領域來處理國際政治或軍事問題。可見，新的安全威脅之所以會出現，經常是因為人們把安全認知與權力、利益關係聯結在一起，從而造成彼此對安全威脅之敵意或善意在認知與需求上的差異。所以，新的安全威脅應該是來自於彼此安全關係的相對強度，以及處理威脅之意願與能力是否對當上的問題，這雖然在範圍、程度上是易變且可操作的；但是人們對安全之認知與利害的相互建構關係，幾乎是亙古未變的。固然這種關係還不至於成為自然法則，卻已經影響人們對安全威脅之研究分析與解釋有相當長遠的歷史。

因而，以整體的角度來看待安全研究會比較務實，它意涵著一種安全架構的觀念，既關照人們認知安全威脅的本體議題，也指涉到如何認識安全指涉對象以及安全政策行動的方法問題，從而對人性的敵意或善意進行解讀。

貳、理論與經驗的問題範疇

就務實的角度看來，當國家在追求權力利益最大化，面對風險大於安全時，對於採取戰爭之競爭性政策選項勢必降低，然而卻又有必要維繫其權力、利益，自然更加可能選擇非競爭性的政策選項，甚至於不排除選擇合作政策，來實現國家安全目標。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的這種觀點，由於著重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相對位置以及博弈獲益，因此與古典現實主義相較起來也就更為務實。而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則對國際合作的可能性與國際制度的能力則給予更高的評價，認為由於制度化所推動的國際間協調機制，將可使

各國的權力與不同的利益關係，因為可以不必太在乎他人獲益的多寡，而合理的預期個人獲益，為國際社會提供新的而穩定的安全機制¹。由於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對國際社會本體的認識，仍然是相信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狀態的，也都以博弈獲益做為認識國際社會的角度，只是新現實主義著重博弈獲益的結果是否相對的多得，與新自由主義注重的以個人能否獲益為前提，他人獲益多寡為次要的認識觀點有所差別。因此在這情境中，具有新聞工作者與博弈分析知能者，將是從事國際政治與安全研究領域研究之菁英，因為新聞工作者的訊息敏銳且途徑靈活多元，而擅於博弈分析者則冷靜理性懂得韜光養晦；但是，前者較欠缺宏觀的分析架構與邏輯推論，後者則精於攻防與務本之道，對於合作或睦鄰政策之認知則顯得不足。雖然，這些傳統的安全研究各有其侷限性，但對於具體的政策建議或戰略性的方針對策，向來著有成效，且從未被國際社會所放棄。

另一方面，對安全議題的認識與辯護，原則上都是以國際體系結構或國際制度與國家行動之關係，做為影響國家安全的變數，只是這種變數分析，經常只能依照可觀察到的事物之性質來分析，其間的次序、強弱或好惡等的差異，會因為不容易找到有客觀又可操作的指標，而不夠明顯，所以自然會影響研究與分析的精準度。當然有識者認為，實際上許多國家安全議題之研究與分析，原本就不需要太精準或過於制式化，因為這將會失去政策選項之彈性，這是安全研究領域既定的特殊屬性。所以，吾人經常可以發現，當識者持現實主義觀點

¹ Ole R. Holsti,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alist and Neoliberal Perspectives 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ugene R. Wittkopf ed.,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3, p.132.

時，會傾向把國際安全議題與無政府狀態相互關聯起來，也就很容易得出國家追求權力利益之行動，會導致安全受到威脅之路徑分析模型，並在權力均衡、失控以及國際間政治、領土、資源爭奪等等層面上，表現出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問題²。相對的，當識者持強調新自由主義觀點時，轉而會比前者更加重視國家內外部情勢、文化等等因素對安全的威脅影響，以及國家權力因素以外的民主、經貿關係、國際體制等等對預防戰爭以及增進安全之作用。然而，在現實的經驗看來，權力均勢似乎只有在對大國有利時，安全體制才有存在的可能性；同樣的，人們也發現，平日組建的安全體制在真正必要的時刻反而是無用武之地的。

固然，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各有其侷限性，但卻引導識者注意到在國際政治中，權力以外的安全議題甚至是彼此的相互依賴關係，更有可能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首要動機或追求目標。所以，這不僅說明了為什麼傳統的安全研究，從未被國際社會與決策菁英所放棄的原由，而其中更重要的意涵，則是從這裡正式開啓了安全研究之堂奧。知識理論的可貴，並不受制於個人明顯的好惡而定，而是端視它是否能與時俱進，或能否給予相關的政策指導以及觀念的啓迪作用。雖然目前各種學說對安全議題之研究分析，都會產生互補的作用，然而可以確定的說，迄今卻仍然沒有任何單一的學說，足以全然涵括或解釋、預測國際安全的複雜性。

然而，當識者發現蘇聯與東歐共黨國家解體與冷戰的結束，並未因此伴隨著人們普遍期待的穩定安全的國際秩序，反而是出現更多與

² John H. Herz,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Pres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7, No.4, p.413.

西方先進國家政治、軍事、經濟與文明相互對立的安全威脅，這些威脅已不侷限於國家層次，而是來自於更多非國家層次的因素，如民族主義、區域聯盟，且彼此對立衝突等領域也擴大到環境、資源、宗教種族甚至政治社會運動等等。因此，識者已經驚覺到，冷戰顯然並未停止，當代才剛開始進入後冷戰時期。

參、相關文獻探討

當然，前述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在理論與經驗上的問題範疇，識者會對其進行沸沸揚揚的質疑與論戰是不難想見的，因為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長期處於國際政治中的主流思潮，各界對其在社會科學上應該發揮預測之功能自然有很高的期望，然而它並未能預期到冷戰結束與國際政治秩序重組的問題，甚至也未能替冷戰後的國際秩序提供重建基礎。但是這種困境，卻讓知識理論界更有機會去思辯安全研究的本體與方法。批判理論（critical theory）即注意到了國際政治秩序重組中國家職能轉換，以及國際社會中出現非國家層次行動者等等的現實。因此，批判理論宣稱國家並非如現實主義所認為或所想定的，國家也不是本身就具有權力，國家權力要經由政治運用才成為可能。從而，國家在不同時期甚至會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向，國家也就在它的特殊功能——成為一種社會各層面形構的粘合（cohesion）因素——中形成，國家正如同社會結構般，是歷史與社會力量建構的產物。批判理論對整體社會結構即採用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的相對概念來論述（discourse），認為國家的本體並不是如現實主義所云是由客觀因素所決定的，國家不應該是與個人世界分離的，而應該

是受到更多主觀的思想、觀念等因素所共同作用的³。

因此，批判理論認為改變國際政治就在改變人們對國際政治的認識。批判理論從而把現實主義的概念給予精緻化，在本體論上修正了現實主義採理性主義把人們的行為與人性，做為客觀、既定世界反應的概念來理解，進而轉向主張國際社會是主體能動與社會實踐的產物，強調行動者認同（identification）的社會建構，以及認知到共享的意義對國際社會研究分析的重要性。同時，批判理論也在方法論上為人們檢證知識可信度與效度的標準，向前邁進一大步，因為它們認為現實主義主要在沿習自然科學的問題解決理論（problem-solving theory）方法，把世界視為可被發現的對象，在可控制的條件中把相關變數設定在問題領域中，以進行精確的路徑分析與檢證，從而歸納出若干具有規律的命題或通則，從而將問題給予控制、解決。然而，批判理論並不把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權力擴張與權力均勢等等核心概念視為理所當然的，如同冷戰結束後的國際現象是具有如此高的不確定性。因此，吾人要研究的對象既然是變動不居的，所運用的概念與方法就應該不斷變化且更加多元化，以充分理解與解釋這些現象，從而如何詮釋這些現象變化的關係才是更重要的議題⁴。也就是說，衡量知識理論的標準並不是像自然科學般，有一定的普遍客觀模式或必然的判斷標準，這個標準應該是人為的被形塑建構出來的標準，應該有著相當的主體與自主性，這其中即涵括了現實主義以外的文化價

³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London, 1998, pp.34~35.

⁴ Robert Cox & T. Sinclair, *Approaches to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6, p.88.; James Bohman, "How to Make a Social Science Practical: Pragmatism, Critical Social Science and Multiperspectival Theory",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3, 2002, pp. 499~524.

值、社會倫理等等相互指涉的元素。

顯然，知識理論對安全議題的研究分析做出新的提問，因為它不僅對於誰是該受到安全保護的主體，以及因為這保護而必須加以反對哪些客體的威脅進行提問，尚且指出安全本體與具體實踐上存在著的差異。同時，它也提醒人們，對如何認識與安全相關的議題，甚至於在運用何種方法獲得安全等等層面上，也會遇到的認識論與方法論產生歧異之問題。從而新的安全論乃在於啓發人們，意識到國家角色與職能轉換之現實，發現到更確切的安全觀念，不應該只是圍繞在主權國家中心論的自我利益來理解的。換言之，若要獲得真正的安全，已經不能只期望建立在犧牲他人利益之上。因為，在許多安全實踐的經驗模式中不難發現，透過人民與社會關係甚至於他國的整體安全，國家自己才得到更多具體的安全。所以，安全是一種彼此互為主體的社會建構觀念，許多的安全威脅、指涉的客體以及具體的安全措施，其實都可以通過人們的觀念成為各種可能與易變的⁵。即使許多論者以為，批判理論要成為具體的安全政策，尚有一段距離，但它卻可以發揮啓迪人們安全觀念的作用，則是不容低估的。其中最明顯的乃是，它也對安全研究的思考產生影響，並開啓日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理論視野。

固然，占有主流地位的現實主義受到知識理論社群對它提出各種之挑戰不斷，然而其中建構主義論者則是較能轉承各家論述並積極尋求創新的學派，這主要是因為建構主義並不以哲學的抽象思辯為出發

⁵ Ken Booth, "Security in Anarchy: Utopian Re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7, No.3, 1991, p.537; James Jay Carafano and Stephen Johnson, "Strengthening America's Southern Flank Requires a Better Effort",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NationalSecurity/g1727.fm>

點，而是以提出若干在經驗上可用的概念，做為解釋國際關係的理論，因此它更加著重在關係變化動因與關係的解釋，以及具體的經驗分析上。建構主義認為，以人們觀察、理解與判斷世界的實際經驗看來，之所以會始終存在著差異與易變性，就是因為彼此的文化、價值觀甚至偏好等等因素，會受到內外部環境之影響，從而讓許多行為形成更多不同的身分與利害關係，使之對彼此的意願、能力與善意或敵意出現不同的解讀。以至於，目前世界上不僅幾乎找不到永恆的真理，也欠缺共同客觀的測量指標，可供人們建立普遍的行為法則，進而做為安全政策行動的依據。所以，建構主義承續了批判理論的認識論基礎，認為世界就是演繹的過程，現實主義所認識的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與其說是物質現象，毋寧較實際的說是一種文化甚至觀念的現象⁶。從而，可以看出建構主義並非對現實主義的全面否定，而是透過既有的現實主義現象、觀念甚至假設等等，給予更多的概念性思考，希望在概念中連接更多領域、層面與議題，好讓識者可以對研究對象獲得更多知識，也就是說研究國際政治之旨趣並非只在於如何追求普遍的行為法則，而是要考量到這種準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對社會行為的抽象概括能力是有其局限性的。

肆、理論的政治意涵與政策運用

事實上，建構主義在方法論上經常引用現實主義的基本立論，並也不排斥主權國家追求權力在研究國際政治中的優先性。只是現實主

⁶ Peter M. Hass and Ernst B. Hass, "Pragmatic Constructivism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31, No. 3, 2002, pp.581~583.

義是比較靜態的對國家行為做無差別的指稱，建構主義則傾向動態的解釋，能對國際社會何以既出現建構或被解構的關係，進一步提出說明。尤其當國家或國際社會之間出現不同的意願或能力，以及善意或敵對等等的建構關係時，更能說明許多安全議題，實際上就是受到觀念分配高於物質力量所影響甚至決定的。這些複雜現象與變化的關係，現實主義多將其化約到主權國家至上的層次中，但是建構主義注意到國家行為存在著戰略文化差異的現實，這才是國家安全更重要的議題。以此看來，吾人可以觀察到國家安全的議題，已經不需再自我侷限在主權國家軍事戰略層面，真正的安全研究應該擴深涵括到社會建構之領域。

由於受到這些國際社會與知識理論社群濃烈互動氣氛的影響，歐陸地區隨即發展出以哥本哈根和平研究中心（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為核心的安全研究學派，其中 Barry Buzan 古典複合安全理論（Classic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的立論，主要即是運用國際社會諸多行動者之間的安全認知與利害關係，來解釋國家安全可以通過彼此在安全的相互依存上，得以說明清楚的。主要的是，國家之間的安全關係相對強度，乃可以被觀察與解釋的，並經由彼此的權力分配與對善意或敵對的認知，形塑出相應的安全複合機制，以減少彼此間的安全困境與軍事衝突。也因為這立論仍然視國家為安全的主要指涉對象，且軍事安全議題依然保有終極的優位性，以至於古典複合安全理論一則要面對批判理論甚至於自己內部，對其政治意涵進行一番批評；然而，卻因為古典複合安全理論能有效運用到歐陸與之外的區域安全研究，故而，乃正因此古典複合安全理論在安全政策

上的作用與效能，從而使其成為推進該理論之重要發展動力⁷。

顯而易見的，古典複合安全理論對國際社會體系內外部行動主體行為轉變的現實意義，較能提出具體的解釋，也就是說識者已經注意到行動主體之間，會經由複雜的語言與規則建構的過程，來塑造世界並可以預期彼此行動的報酬。而不是一如往常千篇一律的，把這些行為轉變事實套用主流的現實主義模式，將之歸納為國家之間追求權力最大化的觀點。換言之，安全研究即應該注意到微觀的行動主體層次與宏觀的國家安全層次，彼此可能存在的相互指涉關係。對此，Nicholas G. Onuf 即以建構主義的觀點，強調微觀與宏觀具有持續的相互構成特性，他把國際社會人們微觀的行為，整理歸納並將其解釋為指導、命令與承諾的三種規則，同時與國際社會相互指涉出宏觀的霸權、階層與治者與被治的政治實踐過程，當此以實踐為基礎的規則有心的被運用，自然會衍生出新的要素，其中更意謂著宏觀的行動意涵，就是有更多的政治概念、言語行為會不斷的被使用或複製，並在有意無意間引導行為規則的變化與概念、制度之創新。由於 Nicholas G. Onuf 運用大量的語言學分析方法，不僅提出「言語行動」（Speech-Act）的概念，為國際社會行動主體與結構在世界中是如何得以相互建構的本體論找尋新的理解途徑，也運用國際社會行為的三種規則，開發出以政治實踐為基礎的語意情境分析工具，來認識與分析國際社會⁸。而他更重要的貢獻，則是盡力開啓以社會做為安全研

⁷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op. cit.*, pp.12~13. ; Copenhagen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Global Governance and Peace", <http://www.copri.dk/research/gov.htm>

⁸ Nicholas G. Onuf, *World of Our Making: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Columbia SC, 1989, p.23 & 29.

究指涉對象的努力，啓迪人們在觀察國際行為規則發生變化之同時，注意還有更多制度化現象其中所蘊涵的社會與實質意義。

基於這種分析方法，Ole Waever 乃把社會安全 (Societal Security) 給予新的認識，也就是所謂的社會安全，是指一個社會在變動不居的環境與潛在或既有威脅下，得以永續保持其本質屬性的能力，並注意到安全議題在主觀與客觀層面上的特性，而客觀意義上的安全乃是指對於社會本然具有的規範、語言、文化等傳統模式，得以在可接受的限度內永續發展；至於，在主觀意義上則是指，前述既有的本質屬性不會受到威脅或攻擊。而社會安全的基本觀念，乃建立在這種可持續與發展的集體認同 (collective identities) 的社會領域中。社會安全的觀念，對安全研究的內容而言，不僅說明了安全議題如何做為一種有序的與能力的觀念，也解釋安全議題在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的既有區別又相互指涉的關係，因為集體認同既做為維繫與再生產社會安全基本觀念的能力，同時也可以成為安全受到威脅的理由，進而要求主張更大的權力。故而，社會安全的概念也就對安全議題的指涉對象，提出更切合實際的解釋，說明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如何構成與維繫彼此不同的認同，以及因著不同的認同所伴隨而來的社會不安全 (Societal Insecurity) 問題，如非法移民與移入國的關係，是同時存在衝突與認同問題的，甚至於還有更多全球化的趨勢，都與社會領域產生安全問題相互聯繫的現象，而且將日益擴大⁹。

事實上，Ole Waever 的觀點已經進一步彰顯出安全議題在政治現實與政策作用上的意涵，因為當一項安全威脅事物已經必要到給予安全化 (securitization) 的時候，同時也就意味著可以運用非常手段動

⁹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op. cit.*, p.120.

用社會資源，甚至會對人民的自由或權利造成限制。而國家為維繫政府系統與社會組織以及意識形態等的穩定，所展現的意願與運用的法制、治理等等能力，都可以政治化成為國家的政策。顯見，安全化固然可能是一種強化國家職能的政治化過程，但是安全化卻又經常面對著國際安全與國內因素的衝擊。因為，各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做為一個行動主體時，它也許會針對國際現實，對國家與國際相關的安全事務，形成彼此互異的安全認同與需求，所以經常造成某些議題被提昇為安全威脅，然而實際上的作用主要是在滿足國內的政治需要，甚至於在壓制國內反對勢力。以既有的經驗題材看來，如伊朗、沙烏地阿拉伯、緬甸等的國家安全政策，長期都建立在宗教政治化的基礎上¹⁰，而中共則把民族主義、人權議題做為安全政策的指涉對象。以此對照歐美先進國家的安全政策，則是完成不同的經驗，因為對歐美先進國家而言，全球議程（global agenda）成為其安全政策指涉對象之重要性，已經更為急迫¹¹。顯然，許多安全化的非常規的權宜措施，實際上也就是國家與內外在因素相互參照的自我實踐過程，它主要的作用在獲取實質的政治影響，並不必然在於追求安全化的最大化結果，而許多安全議題也可能已被安全化或政治化，同樣的安全議題也不必然一定會經過相同的安全化過程。換言之，安全最大化不等同於國家安全最大化。

¹⁰ Lene Hansen, "The Little Mermaid's Silent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Absence of Gender in the Copenhagen School",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No.2, 2000, p.299.

¹¹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Managing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ing Cooperation Through Global Governance", in Charles W. Kegley, Jr. Eugene R. Wittkopf ed., *The Global Agenda: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Beijing, 2003, p.138.

這不也正好說明了理性判斷與經驗世界經常面對正反論題 (antinomies)，它充分說明理性的絕對性，同時理性又有受到事物限制的雙重特性，也就是說許多事物之間並無矛盾，只是無法明白彼此是如此相互聯繫的。所以，Ole Wæver 提醒人們注意到，不應該把所有問題都安全化，安全研究的知識理論與政策實踐的目標，應該是把安全的指涉對象逐步縮減，甚至趨向於非軍事化的境界。顯見 Ole Wæver 這種去安全化 (desecuritization) 的觀念，是更加具有國家安全戰略思考高度的。所以，安全化不僅只是說明哪種客觀的安全威脅存在著，以及何種主觀的意識到威脅的存在，實際還包括非常規的政治或制度上的權宜性作為 (political constellations) 與論述的。從而，不論任何行動主體如何設定安全政策與警戒機制，它的安全判斷必然會與內部因素產生回應、認知等等作用，於是乎，安全化應該是政治與社會因素互為主體的過程，安全事務的屬性不僅不是個別政治菁英所能決定的，而是與社會因素經由「安全言語行動」相互論述所決定的。所以，Ole Wæver 的觀點不僅為人們說明了為什麼目前仍然很難建立一套客觀安全指標的問題，而且國際社會各個行動主體彼此的「安全言語行動」過程互有不同，幾乎很難把行動主體做為安全分析的固定對象，即便如此，安全實踐的過程才是真實認識彼此差異的關鍵，並有助於緩解國際社會的安全困境問題¹²。

再者，因為傳統的安全研究，視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與威脅都是既定的變數，強調物質結構與權力分配、無政府狀態決定了行為的自利性，把國內因素置於相對次要位置，所以經常把國家

¹²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op. cit.*, pp.29~31; Lene Hansen, *op. cit.*, pp.296~297.